

房向东 著

著名作家的 胡言乱语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房向东 著

著名作家的 胡言乱语

—— 韩石山的鲁迅论批判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:韩石山的鲁迅论批判 / 房向东著.—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5458-0277-1

I. ①著… II. ①房…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—思想评论 IV. ①I210.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5859 号

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

技术编辑 丁 多

装帧设计 张 懿

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

——韩石山的鲁迅论批判

房向东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mm 1/32 印张 11.875 字数 280,000

2011 年 1 月第一版 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978-7-5458-0277-1/I·106

定价 34.00 元

序：“反鲁英雄”韩石山、苏雪林优劣比较论

袁良骏

房向东先生写了一部专著，专门批判、驳斥韩石山等人对鲁迅的丑化、诬蔑和攻击。房氏自称“鲁迅门外走狗”，对鲁迅有浓得化不开的深情，文章也深受鲁迅影响，嬉笑怒骂，挥洒自如，充满了“血性”和“酒气”。拜读之下，敬佩莫名，大有江山代有才人出之叹。然而，向东兄却给老朽出了一道难题——让我给他的大著写序。

我比他早生二十多年，论年龄和友谊，这篇序仿佛也写得。然而，如果论水平、论文笔呢？我哪一点比得上向东兄？语云：不畏前贤畏后生。这个序我怎敢提笔？更何况，韩石山等“著名作家”大骂鲁迅的这些年，我身陷《香港小说史》中，不能自拔，对鲁迅研究一无建树。甚至连韩石山等人的骂鲁“高论”我都知之甚少。我有什么资格为向东兄的大著写序呢？然而，向东兄坚持说我写过《鲁迅研究史》，“博古通今”，容易分析比较，非要我写不可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只能遵循“恭敬不如从命”的古训了。干脆，题目就叫《“反鲁英雄”韩石山、苏雪林优劣比较论》。

在拙著《鲁迅研究史》上卷（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版）中“反鲁英雄”苏雪林被放在“鲁迅研究的非常期”（一九三六——一九三七），即全书的第六章的第二十九节“悼念中的诬蔑与攻击”。

我对“反鲁女英雄”苏雪林女士是这样评价的：

人格丑化和人身攻击是反动文人攻击鲁迅的惯伎。鲁迅死后，这种丑化和攻击就更加肆无忌惮了。“鞭尸”的英雄们知道，反正鲁迅无法还手了，怎么骂得痛快、怎么骂得花哨便怎么骂。好像越骂得痛快、花哨，他们就会得到越多的荣誉和奖赏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不能不想到一位骂倒一切的异军突起的“反鲁女英雄”苏雪林。

苏雪林女士与鲁迅并无宿怨。一九三四年冬，她还在《〈阿 Q 正传〉和鲁迅创作的艺术》一文中高度评价鲁迅的小说创作。直到一九三六年四月，在《我创作的动机》（《武汉文艺》第三卷第一期，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）一文中，苏雪林对鲁迅还是满口称赞的。谈到自己创作动机，她说：“我写作时也像鲁迅先生所说，并没有什么白刃在前，烈火在后，还是钉住书桌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。”而且自愧弗如地说：“像鲁迅，即‘挤’，还可以挤出些好东西来，我则非其伦也。”这就说明，直到鲁迅逝世半年前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，苏雪林是并未攻击鲁迅的。但是，鲁迅刚一逝世，苏雪林便马上改换了一副嘴脸，气势汹汹地披挂上阵，开始了她公开攻击鲁迅（她自称为“反鲁”）的事业。

鲁迅逝世不到一个月，十一月十二日，各地的悼念活动尚在进行中，苏雪林便迫不及待地写了一封给蔡元培先生的信，后题为《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》（武汉《奔涛》期刊第一卷第二期，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）发表。这封信，可以看作苏雪林攻击鲁迅的“纲领”，而且，一开口便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。苏文说鲁迅心理“病态”，人格“矛盾”，“褊狭阴险，多疑善妒”，“睚眦必报，不近人情”，“色厉内荏，无廉无耻”，“好谗成癖”，“为所欲为”，“劣迹多端”，狂呼鲁迅为“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，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”。她说鲁迅赞助新文化运动虽有“微劳”，但自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之后，便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，攻击个人，“其杂感文字自

《华盖集》至《准风月谈》约十四五种”，均属此类。而“其文笔尖酸刻薄，无与伦比……含血喷人，无所不用其极”，不仅一无足取，而且祸国殃民。至于鲁迅之“左”倾，苏认为纯属钻营和作伪。她说鲁迅所以“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”，并非相信什么共产主义，无非为了沽名钓誉，讨取青年之欢心。甚至鲁迅“表面蔽衣破履，充分平民化”，也完全是装样子，其实他早已“腰缠万贯”，家私累累了。“其人格之矛盾，言之几不能使人置信”。尤有妙者，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文化“围剿”，到了苏雪林笔下，竟一变而为鲁迅组织的什么“文网”了：“当鲁迅在世时，霸占上海文化界，密布爪牙，巧设圈套，或以威逼，或以利诱，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。有敢撻其锋者，则嗾其羽党，群起而攻，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，一蹶而不复振。文网之密，不啻周来之狱，诛锄之酷，逾于瓜蔓之抄，正士箝口以自保，民众敢怒而不敢言，然后鲁迅乃得巍坐文坛，成为盟主。”更为滑稽的是，苏雪林置鲁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大量文字于不顾，竟说鲁迅“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”，由之再影射攻击鲁迅勾结内山书店（苏先把此书店打成日特机关），“行踪诡秘，所为何事”？在泼妇骂街般地将鲁迅骂了个七开六透之后，苏文即指责蔡先生“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”，实有害党国，罪莫大焉。不知因了什么缘故，苏雪林这篇“讨鲁责蔡檄文”，竟未敢径寄蔡先生（蔡先生至死未见苏雪林这封信的原件），数月之后，才在武汉的一个右翼刊物《奔涛》上发表。

在写完给蔡元培先生这封信后不到一周，十一月十八日，苏雪林又写了一封给胡适的信，一方面肉麻吹捧国民党反动政府“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”，“万不可轻易说反对的话”，一方面大骂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为“庸俗的民众和无知的青年”，而鲁迅，正是这些“庸俗的民众和无知的青年”的一个“偶像”，必须彻底剿除。她提出要“取缔鲁迅宗教宣传”，她自己则表示“不怕干犯鲁

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,很想做个堂·吉珂德先生,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”。在立下这样的“宏愿”的同时,这封信重弹了给蔡元培信中那些攻击鲁迅的谰言,甚至说鲁迅“简直连起码的‘人’的资格还够不着”。她的这些人身攻击,连胡适都觉得太过分了。但苏雪林连胡适的规劝也听不进去,在该信发表时(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),她又写了这样的《自跋》:“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,二十四史儒林传固不会有他的位置;二十四史文苑、文学传,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。”

从鲁迅去世至一九三七年春,苏雪林似乎无暇旁顾,日以“反鲁”为务。《理水和出关》、《说妒》、《富贵神仙》、《论偶像》、《论诬蔑》、《论是非》、《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》、《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》、《论鲁迅的杂感文》等,统统写于这几个月中。综观这些文字,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增加了这样几点“新”内容:一是说鲁迅“俨然一位无冕帝王”,“发号施令,风云变色,顺我者生,逆我者死”;二是说鲁迅既富且吝,“取之也贪”,“用之也啬”,从而使自己成了“富贵神仙”;三是说鲁迅在中国一手造成了“刀笔文化”,亦即“屠户文化”,鲁迅是中国文坛最大的“刽子手”,是“精神上的张献忠”。在她看来,不仅鲁迅的每篇杂文都是“刀笔文化”产品,就连何凝(即瞿秋白)为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写的序言,“每个字也都鲜血淋漓的”。

苏雪林一九四九年以后到了台湾,“反鲁伟业”又有新的发展。仅五六十年代,她即写下了《与共匪互相利用的鲁迅》、《对战斗文艺之我见》、《琵琶鲍鱼之成神者——鲁迅》、《新文坛四十年》、《鲁迅传论》等。一九六六年冬,她将这些“反鲁”文章汇编成《我论鲁迅》出版,并写了一篇带总结性的《自序》。她这时的“反鲁”主要特点为:

一、极力强调鲁迅与中共乃“互相利用”关系,中共有意把鲁迅塑为“偶像”,鲁迅则甘当“偶像”,甘愿为中共“卖命”。

二、对鲁迅人身攻击的“火力更猛”。她说：我要剥去鲁迅偶像外表灿烂的金装，归还他一包粪土。……叫我来评判鲁迅，很简单，三段话便可概括：鲁迅的人格，是渺小，渺小，第三个渺小；鲁迅的性情，是凶恶，凶恶，第三个凶恶；鲁迅的行为，是卑劣，卑劣，第三个卑劣。更以一言括之，是个连起码的“人”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。

三、给鲁迅扣的帽子满天飞舞，据非精确统计，即有“文妖”、“土匪大师”、“青皮学者”、“赤化丹”、“小人之尤”、“虚无主义者”、“绍兴师爷”、“迫害狂患者”、“财迷”、“火老鸦”、“剽悍的狗”、“世故老人”、“大流氓”、“暴君”、“老毒蛇”、“疯老头”等等。至于“罪状”，则有“凶横乖戾”、“癖好谗谀”、“祸国殃民”、“毒痛天下”、“祸延百世”、“乖张可怕”等等。

四、连鲁迅的文学成就也一概抹煞。说什么，“论创作，他不过写了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两本小说，只有《呐喊》里的《阿Q正传》，写得还算不错，但已有人指出有套袭日本作家某作品的嫌疑”。至于《故事新编》，“只能算是插科打诨的小丑口吻，谈不上文学价值”，只能勉强称为小说。

五、极力散布“鲁迅威胁论”，说什么“鲁迅是共产政权的桥梁，是共产政权的象征”，国民党兵败大陆，即“赤焰燎原，大陆变色”，乃“实基于此”。故而，她惊呼“千万莫让鲁迅崇拜在此时此地再行倡导”。她危言耸听地批评台湾论坛近年“捧鲁”有“渐成风气之势”。如不加以制止，那么“鲁迅偶像”很快便会侵入台湾，而“一二年内，全台的知识阶级的心灵，均将屈服于共产主义之下”。

综上所述，苏雪林女士的确不愧为一位“反鲁英雄”。鲁迅生前、死后直至上世纪末，“反鲁英雄”也出了不少（像《鲁迅正传》的著者郑学稼先生者流），但其力度与“贡献”无出苏雪林女士之右者。唯其如此，才见出了韩石山先生的难得。综观他的一遍又一遍的“反鲁讲演”《少不读鲁迅，老不读胡适》（后由中国友谊出

版公司出版),以及另外一些“反鲁”文章,人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新时代的“反鲁英雄”,他的“反鲁”水平从总体上大大超越了苏雪林。

韩石山的最高明之处是对鲁迅、对读者、对听众耍“两面派”,他明明对鲁迅深恶痛绝,但却时时、处处拉出一个客观公允、不偏不倚的架势,似乎他对鲁迅是十分实事求是的。因此其虚伪性、欺骗性、迷惑性远远超出了以苏雪林为首的所有“反鲁英雄”。

韩石山的书就叫《少不读鲁迅,老不读胡适》,似乎对鲁迅和胡适是一样对待的,只不过从“接受美学”的角度,分出了年龄段而已。从这个书名,你能看出韩石山“捧胡贬鲁”的良苦用心吗?更何况在书中你可以不断见到诸如此类的“崇鲁”言论呢:

我敢说千世万世之后,鲁迅的文章,仍是中国最好的文章。他是真正继承了中国文章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,这样的文章一定会像李杜文章那样万古相传的。

鲁迅的文章,那是叫孔老子看了都得说好。

中国是个苦难的国家,苦难中的人民,看鲁迅的书,能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,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发泄。老了读鲁迅的书,就能理解鲁迅的那种苍凉之美,绝望之美了。

鲁迅的一生是值得敬重的。

如果仅仅看这些“韩石山语录”,你绝对会以为他必定是一位鲁迅的“铁杆粉丝”,谁骂鲁迅他一定会跟你“急”的。这就上当了!韩石山是一位“反鲁”的策略家,他认真总结了苏雪林女士等人“反

鲁”的惨痛教训,知道那种跳着脚的破口大骂不仅无济于事,反而徒增反感,事与愿违,绝对达不到“反鲁”目的。他比他(她)们高明千倍万倍,他就是要用那些空洞的、不着边际的甜言蜜语作掩护,然后再用锋利的匕首猛刺鲁迅的软肋,一击而致鲁迅之死命。韩石山之“反鲁”,不是枝枝节节的,而是总体的彻底否定、彻底打垮,他抓的都是他眼中的“鲁迅要害”,这便是:

第一,鲁迅根本不是什么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、“新文学运动”的“旗手”和“主将”,“主将”是胡适、蔡元培、陈独秀(隐隐约约让你感到似乎还有徐志摩和陈西滢),根本没有鲁迅的份儿。不错,鲁迅写了两本小说,暴得大名,但实际上那是算不了什么的,不足道哉。韩石山一再申说,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功勋卓越的是以胡适、徐志摩、陈西滢等人为代表的留学英美派(他简称“英美派”),而不是以鲁迅、钱玄同、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留学日本派(他简称“法日派”)。在他看来,“英美派”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,而“法日派”仅以远不如西方文明的“日本文明”相标榜,他们与“英美派”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,鲁迅怎么可能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“主将”呢?他不仅不是什么“主将”,从一九二三年开始,他还一再与“英美派”的“主将”们作对,反对胡适,反对徐志摩,反对陈西滢,蜕化为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对立面,成了“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”。他的最后十年,和左翼青年一起搞起了“左联”,成了左翼文学的“主将”,即毛泽东所说的“主将”,和“五四”新文学是毫无关系的。这样一来,鲁迅不仅不是什么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“主将”,反而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和罪人了。这就是韩石山的深文周纳,不明就理的年轻人是很容易让他闹得晕头转向的。但稍微了解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史和“五四”新文学史的人都知道,韩石山的这种信口开河把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歪曲到什么程度!他不是仅仅承认胡适、蔡元培、陈独秀为“主将”吗?这三人地下有知,也会愤怒

地搥韩石山的耳光！因为把鲁迅（以及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周作人等）排除在外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还成何体统？没有鲁迅的那些小说和杂文，又何以显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“实绩”呢？胡适生前，曾一再推崇周氏兄弟对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卓越贡献，一再赞美鲁迅的小说“没有一篇不好”。他对苏雪林大骂鲁迅十分反感，严加批评，他公开主张通伯先生（陈西滢）应向鲁迅公开道歉，因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“第一等”的工作，是远远超出了日人盐谷温的，要为鲁迅洗刷“抄袭”罪名。韩石山大言不惭“少不读鲁迅，老不读胡适”，即使不说鲁迅，韩石山对胡适又了解多少呢？他一口一个“英美派”、“法日派”，真叫人笑掉大牙！留学英美的一定比留学日本的高明？这是哪个星球的逻辑？

第二，诬蔑鲁迅阴狠、毒辣、心灵污秽，对鲁迅搞“挖心战术”。

在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演讲中，韩石山说：“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，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学问的。”“我告诉你们吧，从我的接触看，凡是读鲁迅多的人，遵奉鲁迅的人，脾气都很大，不光脾气大，连面部表情都变了，成了这个样子（做立眉瞪眼状），猛一看，真是狰狞可怖。”为了丑化鲁迅，不惜现场表演。这还不够，他还要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，拿鲁迅的身高大做文章。他说：

我对鲁迅的看法是怎样改变的呢？有一件事，我说过好几年了，今天再说一遍。一九八七年我去上海送书稿，顺便去了浙江几个地方，在富阳拜访了郁达夫的长子郁天民先生。郁先生当时六十出头了，有病，说话有气无力的，他问我，二三十年代浙江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说不知道，他说这些人大都是：一、家道中落；二、寡母抚孤；三、个子都很矮小……个子矮小的人狠呀。

韩石山竟然这样绕着弯儿地骂鲁迅！什么郁某某的话？不就是韩石山的话吗？果然，韩石山吐露了真言：

鲁迅有多高呢？前两年我去过厦门大学，校园里塑着鲁迅的全身站像，那么一点个子，好多人都很奇怪，鲁迅怎么会这么矮呢……顶多不会超过一米五五。后来我翻看《鲁迅全集》每卷前面的照片，发现鲁迅很少照全身像，要么是半身，要么是坐着的，一两幅全身照，也是跟别人在一起照的。当然，我们不能以貌取人，但是和前两项连在一起，个子就不能不考虑了。郁天民先生的话，让我对这批文化名人，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。

说来说去，绕来绕去，不就是骂鲁迅个子矮，狠毒，而且自惭形秽吗？连小孩都知道：攻击人家的生理缺陷，这是缺德的。韩石山这样明目张胆地在鲁迅个子矮的问题上大做文章，是否有失一位作家、学者的身份呢？按照韩石山的逻辑，矮个子是否都要枪毙完事？这究竟是哪家的鸟研究？

第三，诬蔑鲁迅和毛泽东一起发动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被人们称为“十年浩劫”，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民的一场巨大灾难，也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。“文革”发动的一九六六年，正好是鲁迅逝世的三十周年。想不到韩石山爆出了惊人之论：鲁迅和毛泽东一起发动了“文革”。请看：

果然到了一九六六年，毛主席就和鲁迅一起发动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不要笑，我是亲身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那时代，只有两本“语录”可以互相打架，一本是《毛主席语录》，一本就是《鲁迅语录》。你说“要团结不要分裂”，他说“损着别人的牙眼，却反对报复，主张宽容的人，万勿和他接近”，对方就无话可

说了。(在中国海洋大学的讲演)

真是天方夜谈!死了三十年的鲁迅竟就搭上了毛泽东的战车,和他一起发动了“文革”。韩石山的论据只有两点;一是毛主席曾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称鲁迅为“五四”文化新军的“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,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,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,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”;二是“文革”中只有《鲁迅语录》可以和《毛主席语录》“打架”。关于第一点,毛泽东的确说过那些话,那些话也并不错。但不管对错,这些话都是毛泽东的一家之言,即毛泽东的鲁迅论,它只能由毛泽东自己负责,而不能由死了三十年的鲁迅负责。要说毛泽东用这些话发动“文革”,也只能说是毛泽东利用死人鲁迅,而和三十年前的鲁迅毫无关系。鲁迅虽然已死,谁利用他他都管不着;谁怎样利用他他也只能听之任之了。这种事,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,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比如中国历代很多封建统治者把孔子封成“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”,把他当成“敲门砖”,难道能让孔子负责吗?明乎此,即使毛泽东有意利用了鲁迅,鲁迅又怎能负责?莫非韩石山不明白这一点?他只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罢了。不是人人痛恨“文革”吗?好,我就把鲁迅和毛泽东绑在一起,把鲁迅和“文革”绑在一起,我就说鲁迅和毛泽东一起发动了“文革”。打他个死无对证,鲁迅还想辩白吗?门儿也没有。这种往死人头上扣屎盆子的战术,也不失为一种战术吧!韩石山在运用这种战术时的斩钉截铁,也实在不愧为一种“勇士”。至于说什么两种语录打架,更是笑谈。“文革”中对立双方打架,主要是《毛主席语录》和《毛主席语录》打,因为这最具权威性,《鲁迅语录》算什么?《马恩列斯语录》又算什么?找了一段语录,就说鲁、毛一起发动了“文革”,骗谁呢?也太“小儿科”了吧!但它却足以说明一点:只要能达到诬蔑、攻击、丑化鲁迅的目的,韩石山是什

么手段都不惮于运用的。

第四,抽象肯定,具体否定,几乎全面否定鲁迅的代表作。

韩石山对鲁迅文章的那些抽象肯定,什么“文比李杜”之类,都是虚的,都是言不由衷的“套话”,是他蒙哄读者(听众)的一种手段,实际上,在分析到具体作品时,他把鲁迅的代表作几乎否定光了,不妨试举数例:

对于《狂人日记》这篇“五四”新文学的奠基之作,韩石山以一种专家里手的口吻,坚决反对它入选中学课本,他说:“读读可以,若作为中学课本,说不定会贻笑于后人。”又说:“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,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资源之单调与贫乏。说来说去,全是旧文人的那一套。”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!《狂人日记》猛烈抨击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,喊出了打倒封建主义的最强音,这是哪国“旧文人的那一套”?“救救孩子!”的呼声也是“旧文人的那一套”?韩石山的思想资源真不知道“丰富”到哪里去了。《狂人日记》这样发聋震聩的佳作怎么不应该入选中学生课本?入选了,怎么就“贻笑后人”?莫非“后人”都像韩石山这样不分好歹吗?

鲁迅自己最喜欢的《孔乙己》,在韩石山眼中也是“失败”之作。失败就失败在它“用那么短的篇幅,写了一个人的一生”。真是怪了,这样精炼之笔,怎么偏偏成了“失败”呢?《药》也不行,“这篇小说最不应该选入中学课本”,据韩石山说,“它的写法十分直露”,“没有写活一个人物。连场景都没有写出来。只有压抑而沉闷的笔调,只有几个鬼魂似的人物飘来飘去,在说明着作者的主题”。人们不能不怀疑,韩石山看过《药》吗?看懂了吗?华老栓、华小栓、康大叔、夏瑜,哪一个人物没写活?华老栓家不是场景?华老栓由康大叔手中买走“人血馒头”不是场景?结尾夏瑜坟上两个老太太的见面、乌鸦“鸦”地一声飞走,这都不是场景?韩石山信口开河得实在太贻笑后人了!

鲁迅的代表作《阿 Q 正传》，自然也不行。韩石山说它“没有结构的严谨，也没有思想的深沉，纯粹以幽默甚至轻慢的笔调调出之……这样的小说，从情操上说，无熏染之必要，从技巧上说，无师法之可能，仅仅因为是鲁迅的名作，便入选中学课本，实在没什么道理可言”。真不愧一位“酷评家”！韩石山甚至说阿 Q 就是农村一个“流氓”。什么“精神胜利法”，什么辛亥革命的失败，什么假洋鬼子、赵太爷、王胡、小 D……统统不见了。要说“思想的深沉”，“忧愤的深广”，在“五四”文学中无一篇小说出此篇之右者，阿 Q，是多么丰富复杂的一个成功典型呀！然而，在韩石山眼中，阿 Q 却只不过是一个农村小流氓，无所寄寓，乏善可陈。中国新文学如不断送在这种“酷评家”手中，那才真是咄咄怪事！

当然不限于小说，鲁迅散文也难逃韩石山“酷评”之笔。比如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这篇优美佳作，便被韩石山糟蹋得不成样子。他说：此文“写一个丑妇人的颀颈与仁慈，毫无美感可言”。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，作者对她是怀念的，但“这怀念中有鄙弃的成分，显得很厚道。……此篇中有一段话，对妇女是人格的慢侮，对少年是心灵的残害。”哪段话呢？就是阿长对幼年鲁迅讲“长毛”故事的那一段：

“那里的话？！”她严肃地说。“我们就没有用处？我们也要被掳去。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，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，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，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；再要放，就炸了！”

一个善良无知的保姆，哄小孩，讲了这样一段愚昧可笑的故事。这里的憨厚而无知的阿长，对“我”极端爱护，正是目不识丁的她为他买来了他朝思暮想的插图的“三亨经”（《山海经》）。结尾呼吁

“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！”哪有一丝一毫的“鄙弃”？一丝一毫的“不厚道”？而这段“戏说长毛”的话，即所谓长毛让妇女脱了裤子站在城墙上御敌的话，充满了幽默感，也充满了对愚昧落后的“女阴御敌”传说的嘲弄，也充分表现阿长的憨厚愚昧，充满了情趣，充满了美感，真是天下妙文一大段！然而，到了假道学韩石山眼中，竟变得罪莫大焉了！还是那句话，韩石山绝不致如此不通，如果这段话为他崇拜的“诗哲”徐志摩所写，那早就美不胜收了。但因为这是鲁迅所写，便必须痛斥一番了。

韩石山处心积虑地否定一篇篇的鲁迅代表作，当然还是为了从整体上否定鲁迅。他说：

看鲁迅的作品，你很难看到一段情绪饱满、酣畅淋漓的话。他的文学主张就是练字，比如他说，写完之后，至少看三遍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词、句删去。删来删去，就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，丰腴没有了，酣畅也没有了。（《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么安排》）

好家伙，鲁迅作品中连“一段情绪饱满酣畅淋漓的话”都没有，鲁迅作品只有“干巴巴”的几条筋。这样的文章，怎可能“堪比李杜，辉煌万世”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鲁迅还怎么是鲁迅呢？韩石山这样信口开河，自相矛盾，就真的不怕“貽笑后人”吗？至于韩文所引鲁迅讲文章修改的那段话，那是对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说的，让他们不要以作品丰富自乐，要注意锤炼，要少要精。这又怎么错了呢？如果对像韩石山这样的空前绝后的大作家，鲁迅怎么可能提出这种低水平的要求呢？

综上所述，不难看出，韩石山的目的就是诬蔑、贬低、攻击、丑化

鲁迅,为达到目的,是可以不择手段的。韩石山口口声声说他如何科学,如何严谨,自我吹嘘说什么“有一分把握说一分话,有八分把握不说十分话”,是这样吗?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!韩石山的胡言乱语满天飞舞,他的鲁迅论实在太耸人听闻了!

不错,他的“智商”比苏雪林高,他善于伪装自己的观点,善于抽象肯定,具体否定,善于装腔作势,故弄玄虚。他这一套是很容易迷惑年轻幼稚的青少年的,但也只是青少年而已。套用韩石山的逻辑,我们也可以幽韩石山一默:

可以迷惑不谙世事的青少年;
难以蒙骗阅历丰富的中老年!

什么“少不读鲁迅,老不读胡适”,见鬼去吧!

韩石山口口声声说“鲁研界里无高手”!是的,鲁研界里确实无有韩石山这样以鲁迅为敌、信口开河、胡言乱语的高手,真是阿弥陀佛,善哉善哉!这不正是鲁研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之大幸吗?!

世界上有这样长的序吗?

是为序。

2009年12月9日于文研所